

● 善用资源造福华社——兼评东禅、报国二寺之筹建——陆承渊

南洋商报于5月23日及5月30日分别在国内版及新北马版刊出筹建东禅寺活动中心和报国寺的消息。据悉，上述两项分别在雪州仁嘉隆和槟州武吉淡汶饮食区进行的建筑工程，筹建东禅寺活动中心需450万零吉，报国寺则耗资1千万零吉，合共耗资1千450万零吉。值此百业萧条、景气低迷之际，1千450万不啻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天文钜额。

事实上，在当前人心丕变、社会风气败坏之时，筹建佛寺以弘法度人，实与广大华社期待提升精神生活品质之愿望契合；然而，筹建如此大手笔之寺宇，其经济支援还必须来自华社。为慎重计，兹提出几项观点，期与上述二寺之主事者共同研究。

一．东禅寺活动中心和报国寺寺宇规模之商榷。我国目前约有2千多万人口，其中华人所占比率不及30%，由于华人宗教信仰多样化（基督教徒、道教徒、神教徒等），真正合乎佛教徒身分者，为数不多。

在有一定数量华人聚集的城镇里，一般均有诸如佛教会、居士林等以在家众为主的佛教团体设立。一些城镇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因地缘关系而常有甲地佛教团体与乙地佛教团体会员发生严重重叠之现象。

所以，尽管如东禅寺主事者发大愿，想建成一个占地6万多方尺，且拥有28间寮房的5层楼复合型多用途礼堂，但衡诸现况，真有建构如此宏伟硬体设备之必要吗？尤其在槟州这一块幅员狭小的小岛上，到处寺宇林立，建造价值逾千万之报国寺的適切性，就不无商榷之余地了。

二．有宗教“托拉斯”垄断华社资源之虞。自1997年股汇风暴以来，中下阶层的华人社会就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长期以来，偏颇的教育政策，令华社独力承受华小、独中庞大教育经费之沉重担子，而动辄募化筹建逾百万、千万信资之寺院，就活像宗教“托拉斯”，一旦通过媒体的包装与组织的技巧，垄断大多数“善款”资源时，华社原本具备资助华教发展之功能，也就相形萎缩。

迹来，世界经济不景，凡和美元挂钩的经济市场均受波及，国内华商在旧伤未愈的情况下，又逢此困境，堪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故此，在国家整体经济渐走下坡的节骨眼筹集巨资时，也应该同时顾及其他团体拮据之处境。

三．提升募化以及管理信资的透明度。在各国宗教团体的财物管理方面，天主教和基督徒向来都具有比较健全的稽核征信制度，而国内佛教团体大体上也能就其募化所得，本着“来自十方，归之十方”的精神，而作有效之运用。

迹今，东禅、报国二寺所涉及之募化金额，非比寻常，宜责成一个高度透明的财务管理委员会，以防主事者遭遇不测时，信资不致落入居心不良之徒的手中；另一方面，更可借此财务管理委员会监督信资之收支。

四．以堂正理由募化信资，借以培养正信。台湾佛光山宗长心定法师鼓励本地信界踊跃支持东禅寺活动中心之重建，据报道，他认为举凡捐款资助建寺之热心人士“都是在修大功德”。

国内许多佛教团体在募化信资时，都不忘以“功德”为号，于是乎，在诸多讲究排场的法会中，乃有所谓“一品、二品、三品”功德主之类的名堂设施，其功德品位之高低，纯取决于所捐款项之多寡。这一类方便设施，似乎是炫人眼目的障道因。果真是款项越多即所得功德越多？那么，那些身无分文的穷困佛门弟子，这辈子岂非注定与“功德”绝缘？

经云：“因地不正，果招纡曲”，若发心不正，若动机不良，其果报只有如达摩所言之“宿善”而已，何能名之为“功德”？

综上所述，筹建寺宇所涉层面极广，非目光如豆者所能竟其功，况且我们应知“人能弘道”，而非“寺能弘道”。寺院多而大，未必意味佛教兴盛。若空有堂皇硬体而独缺优秀弘法人才，则少不免招惹“聚财滥建”之讥。

回顾当初中国佛教之所以经历三武一宗毁佛之劫，个中因由虽有多端，而寺宇富丽、僧员浮烂，亦未始不是遭忌罹祸之要因。

佛教和华社既是共生体，则值此市道低迷之际，任何徒增华社负担之倡议或行动，均属不智之举。是故，至盼东禅、报国二寺之主事者，能体恤华社之苦衷，暂缓大兴土木之计划，待国家经济复苏时，再图建寺不迟。

转摘自[南洋网](#) 2001/06/02